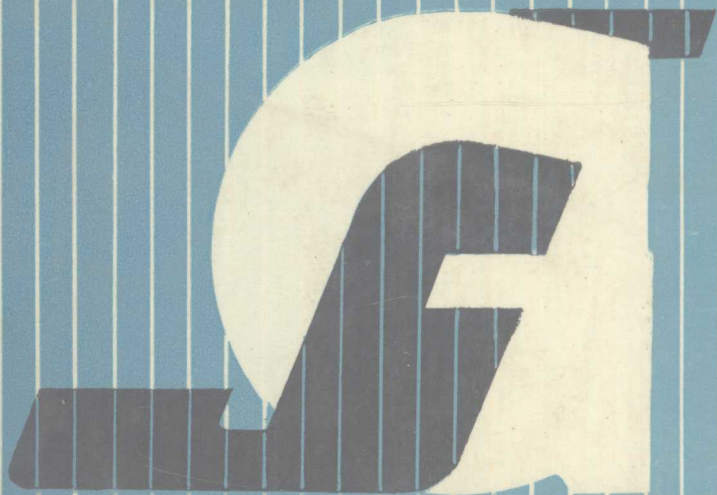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



孙来祥 著

# 规范经济学与社会选择理论



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

---

# 规范经济学与社会选择理论

孙来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介绍了规范经济学与社会选择理论的基本理论，重点研究了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经济福利、经济剩余、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及政府和市场的缺陷问题。书中观点新颖，分析透彻。

### 规范经济学与社会选择理论

孙来祥 著

责任编辑：陈 义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7.875印张 180千字

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301-00882-1/F·077

(平) 定价：3.65元

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顾问

|     |     |     |     |     |
|-----|-----|-----|-----|-----|
| 王 瑶 | 王铁崖 | 厉以宁 | 朱德熙 | 杨周翰 |
| 季羨林 | 陈岱孙 | 苏志中 | 沈宗灵 | 费孝通 |
| 周一良 | 张岱年 | 张广达 | 张玉书 | 胡代光 |
| 黄楠森 |     |     |     |     |

主 编 晏智杰

副主编 彭松建 董学文

编 委

|     |     |     |     |     |
|-----|-----|-----|-----|-----|
| 王 东 | 王 宁 | 王思斌 | 平新桥 | 宁 骚 |
| 冯 棠 | 齐海滨 | 阎步克 | 陈 义 | 张文定 |
| 张京华 | 张晓秦 | 晏智杰 | 董学文 | 彭松建 |
| 睢国余 | 谭卫东 |     |     |     |

## · 出 版 说 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科学研究空前活跃，学术活动空前繁荣，新观点、新理论、新学科不断涌现，老学科不断拓展。置身于教学和科研活动之中的北京大学青年学者勤奋钻研，努力进取，成果累累。

为了支持扶植北京大学青年学者，向老一代学者求教，发扬北京大学学术优势，促进学术梯队建设，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我们编辑出版《北京大学青年学者文库》（以下简称《文库》）。

《文库》以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及在读博士研究生为主要作者对象，力求反映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优秀科研成果，以推动青年学者高层次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为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有改革作贡献。《文库》各种著作的写作在老一代学者的指导下，以老带新、新老结合，传统学科与新学科、传统理论与新理论交互渗透、交融，向祖国和人民展示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水平，以最新学术成果服务于改革和开放，造福于祖国和人民。

《文库》的著作力求做到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新颖的内容、体裁和研究方法，典雅健康的语言文字。

为了编好《文库》，我们特聘请一些著名学者为顾问，编委会负责确定选题，组织评议书稿、审稿等具体工作。

## 序

孙来祥同志原来是学习数学的。他自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投入姜伯驹教授门下，专攻拓扑学，获硕士学位，然后又转入经济管理系，先担任我的助手，以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福利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中，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本《规范经济学与社会选择理论》是他在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有一定的特色，尤其是关于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经济剩余、均等与竞争等章节，写得颇有份量，值得一读。其中有不少看法是他深思熟虑之后提出来的。我想，这些无论是对于专业的经济学工作者还是非专业的经济学工作者，都会有所启发。

孙来祥同志在这本书中，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资源配置的机制问题。规范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实际上是对任何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的价值判断，即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机制是好的或不好的，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机制是值得实现的或不值得实现的，等等。对现实中存在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都将作出自己的选择。因此，孙来祥同志在书中所讨论的，不仅是我国的经济学界，也是全世界经济学界都关心的热门话题。

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但归结起来，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考，即研究经济学，是为了使有限的资源被用于最合理的方面，以便增加社会总的财富，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或者，再深入一步，会有如下回答：研究经济学，是为了寻找一种令人满意的体制或机制，以便合理利用资

源，配置资源，既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又能使财富或收入的分配趋于公平。可见，不重视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忘记了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基本使命。

但从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历来有关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有两种趋向。一种趋向是：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通过市场对经济自发地进行调节的学说。另一种趋向是：从资源配置的过程与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的闲置或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即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即使资源的配置比较合理，社会财富可以增加，但收入分配的失调现象却会变得严重起来，从而必须运用政府的调节职能或计划机制来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至少应用它们来克服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总之，这两种趋向的分歧，就是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是对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估计程度的分歧。

然而，当我们把研究的课题转入我国现阶段的资源配置方面时，我们不难发现，国外有关资源配置的种种观点，尽管其中有不少可供借鉴的内容，但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仍有一段较大的距离。我国资源配置问题具有复杂性，不了解我国的企业在传统经济体制和双轨经济体制之下是怎样进行产、供、销的，不了解在传统经济体制和双轨经济体制之下我国的政府机构是怎样介入生产和流通，怎样干预企业经济活动的，那就不可能对我国资源配置的症结所在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不可能针对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当然，孙来祥同志的这本书是一本理论著作，在这里找不到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问题的现成的、具体的方案。这并非本书的任务。但从孙来祥同志提出的问题和论述的过程来看，有关资

资源配置机制的理论探讨可能比提出具体的方案更有意义。在理论上没有说服力或者不能自圆其说的资源配置方案，如今不是不存在，而是可能太多了。它们只是曇花一现的东西而已。所以我认为，与其赶浪头，争时髦，出偏方，不如踏踏实实地先从资源配置理论上下些功夫，作些认真的研究，然后再去设计切实可行的资源配置方案。

资源配置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市场作用的认识。要知道，市场交易活动中的每一项货币支出都与资源组合的选择有关。消费部分涉及市场的销售活动，涉及市场的产出决策；储蓄和投资部分涉及市场的生产活动，涉及市场的投入决策。所有这些支出都是市场选择的组成部分。在市场中将不断地完成这些选择。

但市场决策是由参加市场活动的许许多多企业和个人根据各自的利益而作出的，决策的分散性是市场决策的固有的特征。具体地说，每个企业和个人决定自己投入多少资源，以何种形式组合资源，生产什么样的物质形式的产品，如何销售它们以取得货币收入，并且如何分配所取得的货币收入，包括再次投入多少资源，等等。在市场的投入、产出、分配等决策中，所有各个由企业和个人作出的分散的决策汇集而成整个市场关于资源组合和资源投向的选择或决策。

市场决策的分散性表明，整个市场的选择或决策是由各个个别的选择或决策所导致的，而并非先有整个市场的选择或决策，再由它来导致各个个别的选择或决策。应当注意的是，各个不同的企业和个人的目标不一定相同，他们的偏好不一定一致，他们对市场前景和各自获利的前景的预期也不一定吻合，甚至在这些方面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因此，整个市场的选择或决策的倾向是由大多数企业和个人的选择或决策的倾向所决定的。当大多数企业和个人的目标和偏好相似，而且对市场前景和各自获利的前景

持有乐观的态度，从而有增加资源投入的倾向时，整个市场的选择或决策将是扩张性的或进取性的，这样，经济就增长。反之，在大多数企业和个人的目标和偏好相似的前提下，当他们对市场前景和各自获利的前景持有悲观的态度，从而有减少资源投入的倾向时，整个市场的选择或决策将是收缩性的或保守性的，这样，经济就停滞、衰退。

在市场决策具有分散性这一固有特征的经济环境中，信息的完备和信息的畅通是保证每个参加市场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能够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从而也有利于整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协调的必要条件。信息的完备包括了每个企业和个人都能了解到社会上现有资源的组合和使用情况，从而等于了解到其它企业和个人所作出的选择或决策；信息的畅通指对这些情况的了解将是及时的、迅速的、低成本的。假定符合了这些条件，那么即使市场决策是分散的，但分散的决策仍然能满足资源配置趋向合理的要求。假定符合了这些条件，那么即使客观上存在着供给方面的约束（资源的约束）或需求方面的约束（市场的约束），分散的决策也可以在供给不足或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供求状况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变动对供求变动的影响，尽可能使资源的配置趋向于合理，尽管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合理。

市场的供求状况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变动对供求变动的影响，体现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市场的引导是从动态均衡的角度来考察的。可以把整个市场的经济活动划分为若干阶段。前一阶段的市场供求状况不仅决定了现期的价格水平，而且通过价格这一指示器，对后一阶段的供求发生影响，从而预示了价格的可能变动方向与变动幅度，而价格的这一可能的变动又将影响再下一个阶段的供求与价格。如此持续不已，市场引导了社会对资源的利用、资源的组合、以及资源由潜在的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与具体方式。因此可以认为，市场所引导的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各个

企业和个人的选择或决策。换言之，通过对资源配置机制的规范研究，可以了解到，为什么社会上对某一种资源的使用量会越来越大，而对另一种资源的使用量会越来越小；为什么某一种资源的供给量会逐渐增加，而另一种资源的供给量会逐渐减少；为什么这一种资源组合形式会渐渐被另一种资源组合形式所代替；为什么投入这一部门的资源会被转投于另一部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可以用市场引导作用来予以回答，而且可以由此说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的合理性。

如上所述，市场选择无非是投入的选择、产出的选择、分配的选择，而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资源组合的选择。但如果社会经济中的资源供给是有限的，并且不同的资源的短缺程度不相等，那么就需要有政府的调节。政府调节的作用正在于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投入、产出和分配的选择，即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微观经济单位感到某种资源组合方式对自己比较有利，某种资源组合方式对自己比较不利，从而作出符合政府意图的选择。政府调节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不是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各个微观经济单位，而是使微观经济单位在政府调节的作用之下产生内在的动力，以自己的选择行为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微观经济单位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应当由于政府的调节而有所削弱。

在这里，特别需要把政府行为理想化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进行对照。前者认为政府有各种手段可以运用，它能掌握充分的信息，能够通过分析手段对客观存在的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样，政府实际上是一个万能的政府，只要它准备怎样进行调节，它就能主动地采取调节措施，按原定计划进行调节，而且一旦它采取了相应的调节措施，它就一定能达到目的。因此，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与此不同，它建

立在另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信念之上。这是指：

理想化的政府正如理想化的人一样，是书本上的东西，是某些学者头脑里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政府，即使它是由最有经验、最有能力的人组成的，但仍然会有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限制。它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从而不可能在掌握了全部信息之后再作出决定。何况，即使它有可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作出决定，但为此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过长，付出的代价可能太大，所以这也是缺少实用价值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也不可能对经济变动的前景和政策实行的一切后果有确切的了解，许多情况是政府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如果事情的进程与政府的预料不一致，政府只好采取事后调节，而事后调节的效果又取决于政府本身的力量大小。既然政府的力量受到种种限制，所以事后的调节也不一定是合乎理想的。

这一切充分表明，把政府行为理想化，实际上忽略了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易变性。例如，政府用来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在实施之后，总要有一段时间间隔才能发挥作用。当然，假定政府了解到自己的调节措施的效应是滞后的，那么从理论上说，政府不妨采取超前性的调节措施，以便把从开始实行调节到调节措施发挥作用之间的时间间隔缩小或消除，但这是不现实的。政府采取超前的调节措施的可能性很小。政府不可能在资源配置问题还没有明显暴露出来的时候就预先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政府更可能是资源配置的事后调节者，而不是事前调节者。这样，调节措施效应的滞后也就难以避免。这种滞后性必定缩小了调节的效果。此外，在开始实行调节到调节措施发挥作用之间的这段时间间隔内，很难认为情况不会发生变化，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还等不到上一轮的调节发挥作用，由于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又推出第二轮的调节措施，而又等不到第二轮的调节发挥作用，情况的再次变化又不得不推出第三轮的调节措施……即使我们还不能

由此得出政府调节没有什么效果的论断，但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在资源配置中，政府的调节难以达到预定的目标，第二，在资源配置中，政府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也就是常常处于“事后补救”的境地。

又如，当政府为了预定目标而采取影响资源配置的措施时，虽然主观上想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投入或产出行为，但这些调节措施并不是那么灵活的。价格刚性、工资刚性、就业刚性、福利刚性等等的存在，使得政府只能达到或接近某一方面的调节目的，而难以达到另一方面的调节目的。比如说，即使政府花费较大的努力，要想把价格降下来，把工资降下来，把就业人数减少，或把福利支出减少，都不易做到。换言之，如果说在某种情况下，唯有把价格、工资、就业率、福利支出在国民收入或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降低才能实现资源的比较合理的配置，那么政府的力量实际上是有限的。再说，由于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和居民作为储蓄主体各有不同的动机，而且居民的储蓄动机要比企业的投资动机复杂，因此政府的调节措施在影响投资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要比影响储蓄方面所取得的效果明显。这意味着，如果说在某种情况下，唯有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或者唯有使储蓄少转化为投资才能实现资源的比较合理的配置的话，那么政府的力量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

因此，在资源配置机制研究中，有必要研究政府行为的适度问题。这是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重要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能不能认识到自己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的作用和可能起的作用。由于市场调节存在着局限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可能只从个别边际收益来考虑而忽视社会边际收益，因此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到主动调节的作用。但由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希望起到的调节作用只表明政府的一种意愿，实际上，政府不可能把政府调节的期望值定得过高，而宁肯现实一

些，从现实的条件出发来进行适度的调节。只有当政府认识了这些，政府行为才有可能优化。政府行为的适度正是政府行为优化的前提。这就是说，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某些消极作用和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作为原则。这是因为，政府在调节资源配置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如果是直接投入和直接产出的措施，那么考虑到政策效应的滞后和政策效力的递减等等，它们的非理想化程度会更大一些；如果是以间接调节的方式出现，即以限制市场调节的某些消极作用和促进市场调节的某些积极作用的方式出现，那么即使政策效应是滞后的，并且政策效力是递减的，但只要政策措施配套得当，仍然可以使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尽可能符合预定的要求。政府调节行为优化，可以较好地通过政府对市场的影响而表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是排除在某些场合政府直接投入和直接产出的必要性，也不是说政府直接投入和直接产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与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调节行为优化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使政府调节达到预定的效果，直接投入和直接产出仍然不可缺少，正如政府还始终保留着对经济干预的“最后手段”一样。这只是说，在政府直接投入和直接产出同政府对市场的影响二者能够实现相同的目标的场合，后者更符合于政府调节行为优化的原则。

我深信，读者如果细读了孙来祥同志这本著作，一定会对资源配置机制的价值判断问题有较深刻的了解，也一定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有较全面的认识，从而就会真正领会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之间的关系。我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在现阶段，在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关系的研究、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源配置机制的研究、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选择和政府选择问题的研究之中，还有许多课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也许认为这方面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或者基本上被解决了，其实不然。我们只是刚刚进入这一广阔的学术领域，探索正在开始，研究工作正在起步。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经济学工作者，象孙来祥同志那样，踏踏实实地作些钻研，写出较有份量的专著。

厉以宁

1988年6月24日

于北京大学

# 导 言\*

\*\*\*\*\*

1 规范经济学又称为福利经济学。它旨在回答经济学中“该不该”、“应该如何”之类的问题。从研究内容来看，它明显区别于旨在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问题的实证经济学，但在研究方法上，规范经济学同样大量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和数学、逻辑推理，以期从一定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假定出发，推演出一系列评价、指导经济活动的定理和命题。

规范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它不仅是财政学、成本-收益分析等应用经济学（相对而言）的基础，而且也是政府制定诸如国际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福利政策（如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等）的基础。进而，可以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另一基础被认为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近年来，甚至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也开始关注福利理论分析（微观经济学的理论研

---

\* 导言的主要内容曾刊登于《经济学动态》1986年第3期，成书时作了进一步加工。

究中一直贯穿着福利理论分析)，即规范经济学理论。总之，规范经济学在西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为了在政府确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时有益地应用经济理论，需要建立一些指导方针和标准作为规范，这就是规范经济学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大多数实际政策问题往往比较复杂，难以作出简易的回答。例如，如果某一变革将增加国民收入，但会带来收入分配上的更加不平等，这种变革是可取的吗？如果一种政策使一部分人的处境改善而使另一部分人的处境变糟，它是否可取呢？政府的收入应来自直接税（如所得税）还是间接税（如营业税）？应该实行自由贸易呢还是实行关税壁垒？应该通过税收呢还是通过立法来对付污染？稀缺的资源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予以保护，且怎样才能达到有效配置？如何对待“平等”和“效率”的交替问题？经济增长是好事情吗？规范经济学主要在理论角度讨论这些现实的、棘手的规范性问题，并不涉及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分析。当然，这首先表明规范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条船上效力的，是以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发展为目的的，从而必然具有辩护性和虚伪性。对此，国内学者已有不少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此处不再重述。作者想着重指出的是，上述一系列棘手的现实问题，在任何经济体制条件下都会尖锐地碰到，它们集中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而来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就决定了以解决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中心的规范经济学中有较大一部分定理和命题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我们有必要对其加以认真、深入的研究。

从思想意识的层次看，具有浓厚伦理规范色彩的规范经济学在西方具有更为深刻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民众的经济意识和素养之中。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李特尔所指出的：“我不以为这个理论已经或多半会对政治事件或经济政策发生重大的直接影响。但在争辩它要发生微小的或不发生影响时，我不相信我是在做拳击

练习，因为这个理论很可能发生巨大的间接影响。这是由于它可以塑造大学生的见解，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一些结论变成了普通语言，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好象它们是最明显不过的科学真理一样。”<sup>①</sup>大量国际经验也的确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民众的经济学素养和经济意识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之一。也就是说，经济学知识普及程度越高的国家，往往经济越活跃、越发达。对此值得人们深思。

2 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收入的合理分配是规范经济学的中心课题，也是经济学中的两大难题。它们之所以是难题，既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的不易确定有关，又与经济运行过程中难以同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收入的合理分配有关。究竟什么是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什么是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讨论中必然涉及基本价值判断，即基本评价标准，需要进行规范性研究。由经济运行的实证性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规范性分析，这应该是理论探讨的深化。

关于资源配置问题，规范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判断是所谓帕累托原理：如果某一变革使一部分人的处境改善而其他人的处境并没有变糟，则这一变革是可取的。这其实是人们所追求的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满足这一“最小—最大”原则的体现之一，只不过说法更严格些。在生产领域，帕累托原理的这一效率意义就更清楚了：如果一项变革使得一部分产品的产量增加，而没有其他产品产量减少，那么这一变革是提高效率的变革。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帕累托原理和线性规划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参见本书第二章）。

从帕累托原理出发，规范经济学家借助于数学和决策理论，建

<sup>①</sup> 李特尔：《福利经济学评述》，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页。